

德国部分工时工作的 现状及保障： 基于平衡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视角的分析

孙秀明 李清海

摘 要：为解决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部分工时工作作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德国被普遍采纳。本文详细介绍德国部分工时工作的就业情况，分析其为女性青睐的原因，以及对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作用机制，并阐述德国相关政策与法律保障措施。德国的经验对我国引入与发展部分工时工作有较好的启示。

关键词：德国； 部分工时工作； 全日制工作； 工作与家庭冲突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092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讲师 博士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F516.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4)03-0056-15

一、引言

女性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所产生的时间、角色冲突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这个问题在我国尤其严重。目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已

* 本文获得同济大学促进对德学术交流基金资助(项目编号:daz1202ky03)。第一作者感谢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2013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支持，第二作者感谢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2013年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的支持。感谢德国伊尔默瑙工业大学(TU Ilmenau)的魏安德(Joachim Weyand)教授及同济大学孙遇春教授，他们为本文的形成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建议、参考资料及修改意见。

达到 74%，^①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依然对现代社会的两性分工存在影响。女性除了要完成工作任务，还需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履行照顾子女等家庭责任。工作与家庭的兼顾给我国女性带来巨大的时间和角色压力。从 2013 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许多符合二胎政策的年轻夫妇面临是否生育二胎的选择，造成两难选择的原因之一便是家庭与工作的平衡问题。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把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劳动力红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我国底层劳动者，包括女性劳动者的低福利、或者说“负福利”^②，在生育、照顾子女等方面的牺牲，成就了我国的经济增长。^③这种低福利、“负福利”给我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声誉，即中国部分企业的竞争力不是来自创新，而是来自劳动者、特别是女性劳动者的不合理付出。这种增长是否可持续，是否符合幸福中国的宗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尽管已有较多研究关注上述问题，但迄今的研究大多从企业角度出发，关注微观层面（个体、家庭）及中观层面（组织）如何缓解员工因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而产生的压力，而忽略了宏观层面的客观条件（社会支持、政策支持、公共服务）。^④ 本文认为，从国家政策层面的劳动时间制度中寻找答案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在涉及劳动时间制度的众多方法中，德国的部分工时工作（part-time jobs）最为行之有效。部分工时工作是相对于全日制工作（full-time jobs）而言的，其以周或年为基数的平均工作时间少于全日制工作人员，所以又被称为非全日制工作。德国视每周工作时间低于 36 小时为部分工时。^⑤ 该制度以其工作时间的弹性化、灵活性得到企业和劳动者的青睐，且在政策、法律体系的保障下得到规范有序的发展，成为德国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重要途径。

尽管中德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但我国的“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模式与德国的“男性养家模式”（male breadwinner model）存在相似性，因此部分工时工作具有解决我国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可能性。本文详细介绍德国部分工时就业的现状、作用及其保障体系，以期对我国利用部分工时制度平衡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提

^① 数据来源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1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

^② 王绍光：《中国仍然是低福利国家吗？——比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新跃进”》，载《人民论坛》，2013 年第 22 期，第 9-34 页，这里第 28 页。

^③ 秦晖：《“另一个奇迹”：南非经济发展的“低人权成本优势”》，载《“市场化三十年”论坛论文汇编（第一辑）》，2008 年，第 166-174 页。

^④ 林忠、鞠蕾、陈丽：《工作-家庭冲突研究与中国议题：视角、内容和设计》，载《管理世界》，2013 年第 9 期，第 154-171 页，这里第 154 页。

^⑤ Arne L. Kalleberg, “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 Part-time, temporary and contract work”,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1), pp. 341-365, here p. 343.

供参考与借鉴。

二、德国部分工时工作的现状

角色理论认为,人们行为的性别差异来自于所持有的角色期望。德国属于基督教文化国度,受宗教文化及历史的影响,德国的社会性别角色划分属于保守模式,即女性被赋予了传统的母亲、妻子角色。与此同时,德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在全世界属于最高水平之一,较早的女性解放运动也使得女性更为追求事业的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传统与现代角色的期望,给德国女性带来了较大压力,而这种压力在女性生育子女阶段尤为显著。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德国传统的“男性养家模式”逐渐弱化,两性在社会分工中所承担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问题凸显。为平衡女性的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德国尝试了诸多方案,但部分工时工作制度最为有效。尤其可贵的是,该有效性建立在详细的调研、数据统计分析基础上,并建立了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库,供社会各界检索。^① 以下信息的原始数据多来自该数据库。这些数据和大量的科学研究增加了政策法律制定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并为相关政策法律的修订提供了依据。

1. 部分工时工作与女性幸福感

如果不考虑收入影响,从事部分工时工作中有子女的女性幸福感高于全日制工作或不工作的女性,因为她们既可以通过工作满足社会角色需求,获得社会尊重及自我尊重感,还可以完成家庭角色期望,较好地达到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平衡。^② 因照顾子女等家庭责任,而将全日制工作转换为部分工时工作的员工,工作满意度及对企业的组织认同度均得到提高,离职率降低9%;因家庭与事业冲突而产生的抱怨则减少了13%。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那些在原工作岗位基础上减少工作时间的的女性会比全日制工作时幸福感更高,而那些不能在原岗位采取部分工时就业,被迫更换工作的女性,并不会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③

^① GSOEP(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是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库,专门针对德国人口进行跨学科的、纵向的调查,第一次数据搜集是由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DIW)于1984年进行的,之后演变为每年均进行一次调研的面板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含有工作与家庭平衡、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等方面的数据。数据库网址:<http://www.eui.eu/Research/Library/ResearchGuides/Economics/Statistics/DataPortal/GSOEP.aspx>,访问日期:2014-04-15。

^② Vanessa Gash/Antje Mertens/Laura Romeu Gordo, “Women between part-time and full-time work: The influence of changing hours of work on happiness and life-satisfaction”, *SOEP paper* No. 268, 2010.

^③ Alison L. Booth/Jan C. van Ours, “Job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Happiness: The Part-Time Work Puzzle”,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8, 118(2), pp. 77-99, here p. 93.